

国家与革命

(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
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

第五章

国家消亡的經濟基础

馬克思的哥达綱領批判(即1875年5月5日給白拉克的信,这封信直到1891年才在“新时代”杂志第9卷第1冊上发表,有俄文单行本)对这个問題作了最詳尽的說明。在这篇輝煌的著作中,批判拉薩尔主义的論战部分可以說是遮盖了正面論述的部分,即对共产主义发展和国家消亡之間的联系的分析。

1. 馬克思对这个問題的提法

如果把馬克思在1875年5月5日給白拉克的信同上述恩格斯在1875年3月28日給倍倍尔的信比較一下,从表面上看也許会觉得

国家与革命

(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
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

第五章

国家消亡的經濟基础

馬克思的哥达綱領批判(即1875年5月5日給白拉克的信,这封信直到1891年才在“新时代”杂志第9卷第1冊上发表,有俄文单行本)对这个問題作了最詳尽的說明。在这篇輝煌的著作中,批判拉薩尔主义的論战部分可以說是遮盖了正面論述的部分,即对共产主义发展和国家消亡之間的联系的分析。

1. 馬克思对这个問題的提法

如果把馬克思在1875年5月5日給白拉克的信同上述恩格斯在1875年3月28日給倍倍尔的信比較一下,从表面上看也許会觉得

得馬克思比恩格斯帶有更濃厚的“國家派”色彩，也許會覺得這兩位著作家對國家的看法有很大差別。

恩格斯勸倍倍爾根本拋棄關於國家的廢話，把“國家”一詞從黨綱中完全去掉而用“公團”來代替；恩格斯甚至宣布公社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而馬克思卻還談到“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國家制度”，這就是說，似乎他認為就是在共產主義下也還要有國家。

但這種看法是根本不對的。如果仔細研究一下，就可以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國家和國家消亡問題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上面所引的馬克思的話也就是指正在消亡的國家制度。

至於確定將來“消亡”的日期，這當然無從談起，但很明顯，它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所以有表面上的差別，是因為他們研究的問題和研究的目的不同。恩格斯的目的是要清楚地、尖銳地、扼要地向倍倍爾指明，當時流行的（也是拉薩爾頗為贊同的）關於國家問題的偏見是完全荒謬的。而馬克思只是在論述另一個問題即共產主義社會發展的時候，順便提到了這個問題。

馬克思的全部理論，就是運用最徹底、最完整、最周密、內容最豐富的發展論去考察現代資本主義。自然，他也運用這個理論去考察資本主義即將崩潰的問題，去考察未來的共產主義的未來發展問題。

究竟有什麼根據可以提出未來共產主義的未來發展問題呢？

這裡的根據就是共產主義是從資本主義中產生的，它在歷史上是從資本主義中發展起來的，它是資本主義產生的那種社會力量發生作用的結果。馬克思絲毫也不想製造烏托邦，不想凭空猜測

无法知道的事情。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問題，正象自然科学家提出某一新的生物变种的发展問題一样，因为我們已經知道，这一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的。

馬克思首先扫除了哥达綱領对国家同社会的相互关系問題的糊涂观念。

他写道，……“现代社会，就是一切文明国家里的资本主义社会，都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紀的杂质，仅仅因为每个国家历史发展的特点而在形态上多少有些不同，在发展程度上也多少有些不同。‘现代国家’却是各不相同的。普魯士德意志帝国同瑞士完全不同，英国同美国也完全不同。所以，‘现代国家’只是一种虛构的概念。

但是，不管国家的形式如何紛繁，各个不同的文明国家却有一个共同点：它們都建筑在资本主义多少已有发展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所以它們具有某些极重要的共同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同现在国家的根基资产阶级社会已經消亡的未来相对來說，也可以說‘现代国家’。

其次，还有这样一个問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換句話說，那时会有哪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这个問題只有用科学的方法才能解答；否則，即使你千百次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名詞連在一起，也絲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⑨。

馬克思这样譏笑了关于“人民国家”的一切空話，提出了問題，并且好像是警告說：要对這個問題作出科学的解答，只有依靠确切証明了的科学材料。

十分确切地由整个发展論和全部科学証明了的首要的一点，也是从前被空想主义者所遗忘、现在又被害怕社会主义革命的机会主义者所遗忘的那一点，就是在历史上必然会有一个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別时期或特別阶段。

2. 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馬克思繼續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間有一个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轉变时期。与这个时期相适应的是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这就是馬克思根据他对无产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的分析，根据这个社会的发展情况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对立并且不可調和的实际材料所得出的結論。

从前，問題的提法是这样的：无产阶级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应当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革命专政。

现在，問題的提法已有些不同了：从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非經過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这个专政和民主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我們知道，“共产党宣言”就是把“无产阶级变为統治阶级”和“争得民主”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的。根据上述一切，可以更准确地断定，民主制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是怎样变更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它最順利的发展条件下，比較完备的民主制就是民主共和国。但是这种民主制始終只限于资本主义剝

削的狹小范围，因此它實質上始終只是供少数人、供有产階級、供富人享受的民主制。資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始終与古希腊共和国只供奴隶主享受的自由大致相同。由于資本主义剝削的条件，现代的雇佣奴隶被貧困压得“无暇过問民主”，“无暇过問政治”，以致大多数居民在通常的和平局面下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

德国可以說是証实这一論断的最明显的例子，因为在这个国家里，有一段很長的时间，几乎有半世紀之久(1871—1914年)，宪法一直承認結社是合法的；在这个时期內，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利用合法机会”方面做的工作要比其他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多得多，特别是使工人参加党的比例达到了举世未有的高度。

那末这种有政治覺悟的积极的雇佣奴隶在資本主义社会里所占的最大的百分比究竟是多少呢？1500万雇佣工人中只有100万是社会民主党黨員！1500万雇佣工人中只有300万是工会會員！

供极少数人享受的民主，供富人享受的民主，——这就是資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如果仔細地考察一下資本主义民主制的結構，那末無論在选举法的“細微的”（似乎是細微的）条文上（居住年限、妇女被排斥等等），或是在代議机关的办事手續上，在行使集会权的实际障碍上（公共的集会場所不准“穷人”使用！），在純粹按資本主义原則办报等等事实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民主制的重重限制。对穷人的这种种限制、禁止、排斥、阻碍看起来似乎是很細微的，特别是在那些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貧穷困苦、从来没有接近过被压迫階級群众的生活的人（这种人在資產階級的政論家和政治家中，如果不占百分之九十九，也得占十分之九）看来是很細微的，但是这些限制加在一起，却把穷人推出和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使他們不能积极参加民主生活。

馬克思出色地暴露了資本主義民主制的這一實質，他在分析公社的經驗時說：這就是容許被壓迫者數年一次來決定壓迫階級中什么人应当在議會里代表和壓迫他們！

但是這種必然是狹隘的、暗中排斥窮人的、因而也是完全虛偽和騙人的資本主義民主制，決不象一般自由主義的教授和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者所想象的那樣是簡單地、直接地、平穩地朝着“日益徹底的民主制”發展的。不是的。向前發展，即向共產主義發展，必須經過無產階級專政，決不能走別的道路，因為再沒有其他人也沒有其他道路能夠粉碎剝削者資本家的反抗。

而無產階級專政，即被壓迫者先鋒隊組織成為統治階級來鎮壓壓迫者，不能僅僅限於擴大民主制。除了大規模地擴大這種第一次供貧民享受、供人民享受而不是供富人享受的民主制之外，無產階級專政還要對壓迫者、剝削者、資本家採取一系列剝奪自由的措施。為了使人類從僱傭奴隸制下面解放出來，我們必須鎮壓這些人，必須用強力粉碎他們的反抗，——顯然，凡是實行鎮壓和使用強力的地方，也就沒有自由，沒有民主。

讀者總還記得，恩格斯在給倍倍爾的信中已經很好地闡明了這一點，他說：“無產階級需要國家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到了有可能來談自由的時候，國家就不存在了。”

絕大多數人享受民主，對那些剝削和壓迫人民的分子實行強力鎮壓，即不允許他們參加民主生活，——這就是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的民主制。

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只有當資本家的反抗已經徹底粉碎，資本家已經消滅，階級已經不存在的時候，即社會各個成員在對社會生產資料的關係上已經沒有什麼差別的時候，——只有

在那个时候，“国家才会消失，才谈得上自由”。只有在那个时候，真正完备的、真正没有任何例外的民主制才有可能实现。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民主制才开始消亡；道理很简单，因为人们既然摆脱了资本主义奴役制，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制所造成的无数残暴、野蛮、荒谬和卑鄙的现象，也就会逐渐习惯于遵守数百年来人们就知道的、数千年来在一切处世格言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自动地遵守这些规则，而不需要强力，不需要强制和服从，不需要所谓国家的这种特别的强制机关。

“国家消亡”这句话说得非常恰当，它既表明了过程的渐进性，又表明了过程的自发性。只有习惯才能够而且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作用，因为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如果没有剥削，如果没有某种会引起抗议、起义并使镇压成为必要的令人气愤的现象，那末人们是多么容易习惯于遵守他们所必需的公共生活规则。

总之，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制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制，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制。无产阶级专政，即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第一次提供了人民享受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制，同时对少数人即剥削者实行必要的镇压。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提供真正完备的民主制，而民主制愈完备，它也就愈迅速地成为不需要的东西，愈迅速地自行消亡。

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下存在的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即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少数人镇压多数人的特别机器。很明显，为了达到剥削者少数始终压迫被剥削者多数的目的，就必然要采取极凶恶极残酷的镇压手段，就必然会造成无数流血惨案，而这样的流血事件是人类在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制下都经历过的。

其次，在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候鎮壓還是必要的，但這已經是被剝削者多數對剝削者少數的鎮壓。特別的鎮壓機關，特別的鎮壓機器即“國家”，還是必要的，但是已經是過渡性質的國家，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因為由昨天還是雇傭奴隸的多數人去鎮壓剝削者少數人是一件比較容易、比較簡單和比較自然的事情，所流的血也會比從前在鎮壓奴隸、農奴和雇傭工人起義時流的少得多，人類為此而付出的代價也要小得多。而且這種鎮壓同絕大多數居民的廣泛的民主是不違背的，因而對特別的鎮壓機器的需要就開始消失。自然，如果沒有極複雜的鎮壓機器，剝削者就不能鎮壓人民，但是人民鎮壓剝削者，卻只要有很簡單的“機器”，甚至可以不要“機器”，不要特別的機關，而只要有武裝群眾的組織（如工兵代表蘇維埃，——我們先在這裡提一下）。

最後，只有共產主義才能夠為完全不需要國家創造條件，因為那時已經沒有人須要加以鎮壓，——這裡所謂“沒有人”是指階級而言，是指對某一部分居民進行有系統的鬥爭而言。我們不是空想主義者，我們絲毫也不否認個別個人搗亂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樣也不否認有鎮壓這種搗亂的必要性。但是，第一、做這件事情用不着什麼特別的鎮壓機器，特別的鎮壓機關，武裝的人民自己會來做這項工作，而且做起來非常簡單容易，正象現代社會中任何一群文明人都很容易去勸解打架的人或制止虐待婦女一樣。第二、我們知道，產生違反公共生活規則的搗亂行為的社會根源是群眾受剝削和群眾貧困。這個主要原因一消除，搗亂行為就必然開始“消亡”。雖然我們不知道消亡的速度和進度怎樣，但是，我們知道這種行為一定會消亡。國家也會隨着這種行為的消

亡而消亡。

馬克思並沒有凭空幻想这个未来的远景，他只是更詳細地确定现在所能确定的东西，即共产主义社会低級阶段和高級阶段之間的差別。

3. 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馬克思在“哥达綱領批判”中，詳細地駁斥了拉薩尔关于工人在社会主义下將領取“不折不扣的”或“全部劳动产品”的思想。馬克思指出，在整个社会的全部社会劳动中，必須拿出一部分作后备基金、作扩大生产的基金和补偿“磨損了的”机器的費用等等，然后在消費品中还要拿出一部分作为管理費以及学校、医院、养老院等等的基金。

馬克思不象拉薩尔那样說些含糊不清的籠統的話（“全部劳动产品归工人”）。而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必須怎样管理的問題作了冷靜的考察。馬克思在具体分析这种沒有資本主义存在的生活条件时說道：

“我們这里所說的”（在分析工人党的党綱时）“不是在自身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是从資本主义社会里刚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思想方面，都还帶有它脫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这个刚刚从資本主义脫胎出来的在各方面还帶有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級阶段。

生产資料已經不是个人的私有財產，它已归整个社会所有。

社会的每个成员都担负某一部分社会所必需的工作，并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完成了多少工作量。根据这张证书，他从消费品的社会储藏中领取相当数量的产品。这样，除去作为社会基金的一部分劳动之外，每个工人就从社会方面领取相当于他所贡献的一份报酬。

这样，似乎“平等”就实现了。

但是，拉萨尔把这样的社会制度（通常叫做社会主义，而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说成是“公平的分配”，说成是“每人有获得同等劳动产品的平等权利”，这是错误的，马克思就对他的错误进行了分析。

马克思说：这里确实有“平等权利”，但这还是“资产阶级的法权”，它同任何权利一样，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任何权利都是把同一标准应用在事实上各不相同、各不相等的人身上，因而“平等权利”就是不平等，就是不公平。的确，每个人付出同别人相等的一份社会劳动，就能领取一份相等的社会产品（除了上述扣除的以外）。然而每个人是不同的：有的强些，有的弱些；有的结了婚，有的没有结婚；有的子女多些，有的子女少些，以及其他等等。

马克思总结说，……“因此，在同样的劳动下，在平等地享受社会消费品的条件下，某一个人实际上比另一个人领得多一些，这个人就会比另一个人富裕一些等等。为了避免这一切，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所以，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富裕的程度还会不同，不同就是不公平。但是人剥削人已经不可能了，因为那时已经不能把工厂、机器、土地等生产资料攫为己有了。

馬克思駁倒了拉薩爾關於一般“平等”和“公平”的含糊不清的小資產階級說法，指出了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進程，說明這個社會最初只能消滅私人占有生產資料這一“不公平”現象，卻不能立即消滅“按工作”（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費品這一仍然存在的不公平現象。

庸俗的經濟學家（包括資產階級的教授和“我們的”杜岡^①在內）經常譴責社會主義者，說他們忘記了人與人的不平等，“夢想”消滅這種不平等。我們看到，這種譴責只能證明資產階級思想家先生們的極端無知。

馬克思不僅極其準確地估計到人們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且還估計到，僅僅把生產資料轉歸全社會公有（通常所說的“社會主義”）還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點和仍然占着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法權”的不平等，因為產品是“按工作”分配的。

馬克思繼續說道，……“但是這些缺點在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在經過長久的陣痛以後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脫胎出來的形態中，是不可避免的。權利永遠不能超過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決定的社會的文化發展”……

因此，在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通常稱為社會主義），“資產階級的法權”沒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經發生的經濟變革範圍內，也就是在對生產資料的關係上取消。“資產階級的法權”承認生產資料是個人的私有財產。而社會主義則把生產資料變為公有財產。只有在這個範圍內，也只能在這個範圍內，“資產階級的法權”才不存在了。

^① 指俄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杜岡·巴拉諾夫斯基。——譯者注

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員間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調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則已經实现了；“按等量劳动領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則也已經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不同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領取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的法权”。

馬克思說，这是一个“缺点”，但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愿陷入空想主义，那就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們立即就会不需要任何法规而为社会劳动，况且资本主义的废除不能立即为这种变更創造經濟前提。

可是，除了“资产阶级的法权”以外，沒有其他法规。所以在这个范围内，还需要有国家来保卫生产資料公有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分配的平等。

那时国家就会消亡，因为资本家已經沒有了，阶级已經沒有了，因而也就沒有什么阶级可以鎮压了。

但是，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还要保卫容許在事实上存在不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法权”。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就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

4. 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級阶段

馬克思接着又說：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級阶段，迫使人們奴隶般地从服从社会分工的现象已經消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劳动已不仅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生产力已随着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而增长，一切社

會財富的資源都會充分地湧現出來，——只有在那時候，才能徹底打破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觀點，社會才能把‘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寫在自己的旗幟上。”

現在我們才認識到，恩格斯無情地譏笑那種把“自由”和“國家”這兩個名詞連在一起的荒謬見解，是多麼正確。還有國家的時候就不會有自由，有了自由就不會有國家。

國家完全消亡的經濟基礎就是共產主義的高度發展，那時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已經消失，因而現代社會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也就消失，而這個根源光靠生產資料轉為公有財產，光靠剝奪資本家，是決不能立刻消除的。

這種剝奪會使生產力有蓬勃發展的可能。既然我們看到資本主義現在已經怎樣難以想象地阻礙着這種發展，而在現有的技術基礎上又可以大大推進生產力，我們就可以有十二分把握地說，剝奪資本家一定會使人類社會的生產力蓬勃發展。但是，生產力將怎樣迅速地發展，將怎樣迅速地打破分工、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把勞動變為“生活的第一需要”，這都是我們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

因此，我們只能談國家消亡的必然性，同時着重指出這個過程是長期的，它的長短將取決於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發展速度。至於消亡的日期或消亡的具體形式問題，只能作為懸案，因為現在還沒有可供解決這些問題的材料。

當社會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時，也就是說，在人們已經十分習慣於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規則，他們的勞動生產率已經大大提高，因此他們能夠自願地盡其所能來工作的时候，國家才會完全消亡。那時，“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觀點”，

这种使人象夏洛克^①那样冷酷地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观点就会打破。那时，社会就不必在分配产品的时候规定每人应当领取的产品数量；每人将“根据需要”自由地领取。

从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很容易把这样的社会制度說成是“純粹的烏托邦”，并冷嘲热諷地說社会主义者許过諾言，要使每个人都有权利向社会領取任何数量的香菌、汽車、鋼琴等等，而对每个公民的劳动則可以不加任何监督。就是在今天，大多数资产阶级“学者”也还是用这种諷刺的話来搪塞，但他們这样做只是暴露了他們的愚昧无知和为资本主义辯护的自私目的。

其所以說愚昧无知，是因为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想到过要許下共产主义高級发展阶段一定到来的“諾言”，而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在預见这个阶段将会到来时所設想的前提，既不是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现在的庸人，因为这种庸人正如波米亚洛夫斯基小說中的教会学校学生一样，慣于“无故地”破坏社会財富的儲藏和提出不能实现的要求。

在共产主义的“高級”阶段到来以前，社会主义者要求社会和国家对劳动量和消費量实行极严格的监督，不过这种监督应当从剝夺资本家和由工人监督资本家开始，并且不是由官僚的国家而是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来实行。

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他們的走卒，如策烈铁里先生、切尔諾夫先生之流）为要达到替资本主义辯护的自私目的，就一味爭論

① 夏洛克是英国作家莎士比亚的剧本“威尼斯商人”中的一个典型的高利貸者。——譯者注

和空談遙遠的未來，而不談目前政治上的迫切問題：剝奪資本家，把全體公民變為一個大“辛迪加”即整個國家的工作人員和職員，并使整個辛迪加的全部工作完全服從真正民主的國家，即工兵代表蘇維埃的國家。

其實，當博學的教授以及附和他的庸人們和策烈鐵里先生、切爾諾夫先生之流談到荒誕的烏托邦，談到布爾什維克的蠱惑人心的諾言，談到不可能“實施”社會主義的時候，他們指的正是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但是，不僅誰也沒有許過“實施”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諾言，而且連想也沒有想到“實施”，因為這根本不是可以“實施”的。

這裡我們也就要講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科學上的差別問題，這個問題在上面引用的恩格斯說“社會民主主義者”這個名稱不恰當的一段話里已經談到。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同共產主義高級階段之間的差別，在政治上說，將來也許很大；但現在在資本主義下着重來談它就很不可笑了，至於把這個差別提到首要地位的也許只有少數無政府主義者（這是說，如果在克魯泡特金之流，格拉弗、柯爾涅利遜以及其他無政府主義“大師”們“象普列漢諾夫那樣”變成了社會沙文主義者，或象一個沒有喪失廉恥和良心的無政府主義者格耶所說的那樣變成了無政府主義“衛國”戰士以後，無政府主義者當中還有人絲毫沒有學到什麼東西）。

但是社會主義同共產主義在科學上的差別是很明顯的。馬克思把通常所說的社會主義稱作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既然生產資料已成為公有財產，那末“共產主義”這個名詞在這裡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記這還不是完全的共產主

义。馬克思的这些解释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他在这里也始終应用了唯物主义辯証法，即发展学說，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从資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馬克思沒有經院式地臆造和“虛构”种种定义，也沒有从事毫无意义的字面上的爭論（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而是分析了可以表现共产主义在經濟上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經濟上还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还不能完全摆脱資本主义的傳統或痕迹。由此就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级的法权的狭隘观点”。既然在消費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們遵守法规的机关，权利也就等于零。

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內，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的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沒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这好像是奇談怪論，或只是一种聪明的辯証把戏，那些沒有花过一点功夫去研究馬克思主义的极其深刻的內容的人，就常常这样来譴責馬克思主义。

其实，無論在自然界或在社会实际生活中，我們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新事物中有旧的残余的情形。馬克思并不是随便把“资产阶级的”法权塞到共产主义中去，而是抓住了刚从資本主义腹內脱胎出来的社会里那种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东西。

在工人阶级反对資本家、爭取解放的斗争中，民主制具有巨大的意义。但是民主制决不是一种不可逾越的极限，它只是从封建主义到資本主义和从資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道路上一个阶段。

民主制意味着平等。很明显，如果把平等正确地理解为消灭